

# 阅读

第590期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

## 萝卜田的面积

□ 冯杰

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有一块地，父亲觉得闲置了是浪费。于是，头伏时节，他从集市上买回一包萝卜籽撒下。一场雨后，发出了萝卜苗。

种下的是那种叫“露头青”的萝卜。萝卜容易生虫，我放学后常跟着母亲用针在萝卜叶上挑虫子。

萝卜这种菜蔬在冬天方可显出其重要性，凡是萝卜，不论红萝卜、白萝卜，都可以陪伴一家人过冬。

霜降之后，要出萝卜了。萝卜比红薯好出，挽住萝卜缨，往上一提，就出来了。那些长得周正的萝卜要挖坑埋在地下，这样能保持新鲜。那些长相不好的萝卜就切成片，而后一片一片地挂在铁丝上，晒成萝卜干。萝卜缨也不舍得丢弃，先煮熟再晒干，冬日里做“咸糊涂”时是主要的配菜。

我学习成绩不好或犯其他错误时，父亲会揍我。看到事情不妙，我便绕着这块萝卜田跑，父亲在后面追。我绕着萝卜田跑过多少圈，记不清了。

在这块萝卜田里，演绎着父子二主演的独幕剧。

许多年后，见到过这一精彩场景的乡邻和我提起此事，总会发笑，还会伸出手指比画着，述说当年萝卜田上的“战事”。

我小时候算术不好，碰见那些数字就头疼，我却一直记着这块萝卜田的面积，是30米乘以20米，算术课上叫作长乘以宽。这是一块平面的萝卜田，这又是一块立体的萝卜田。那些萝卜总在我的记忆里摇晃。

在地下的父亲，再也不会揍我了。

现在想起来，我一生都没有跑出这一块萝卜田。

(摘自2025年5月30日《光明日报》)

## 风 骨

□ 冯磊

作家林斤澜淡梁实秋，称他是“滑竿教授”。

抗战期间，梁实秋在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任教。除了正常授课外，他还要到北温泉电化学校兼课，中间路远，只好坐滑竿前行。梁教授下了滑竿，必面带笑容、直奔教室。进了教室，他不问学生到了多少，也不过问课堂纪律，必先从长袍兜里掏出一张长长的纸条。这，就是讲课提纲了。之后，他扫一眼坐在的学生，开讲。

梁实秋在复旦讲西洋戏剧史。他的课只讲史实，一气呵成，绝不拖泥带水。学生听得专注，老师讲得入神。下课铃响，他并不与学生交流，随即上演“三部曲”：收纸条、戴帽子、围围巾，然后走人。

据说，辜鸿铭也极有个性。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又跑回祖国效力的中国人，晚年登上了大学学堂。在北京大学，他的标配是长袍马褂、头顶一条大辫子。北大学生见了这身装束，哄堂大笑。他们喜欢胡适的洒脱和务实作风，喜欢鲁迅的慷慨辞色与忧国忧民，他们不喜欢穿着长袍马褂的“古董”。辜鸿铭扫了学生一眼，淡淡地说：“我的辫子在头顶上，你们的辫子在心里。”

教室里鸦雀无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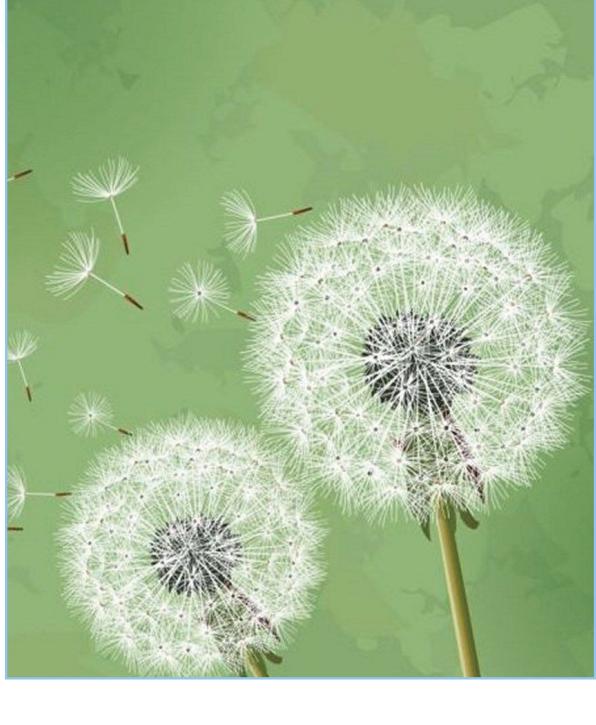
“心灵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这位喝过洋墨水的老先生是懂得的。但是，年轻学生们却未必懂得。他们还年轻，还需要沉淀许多年。

长袍、马褂、大辫子、滑竿、纸条，都是道具。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眼里的神采，和深藏在内心的分寸。

所谓风骨，就是这么回事。

(2025年6月21日《今晚报》)

(摘自2024年6月28日《杭州日报》)



## 父亲的戏剧人生

□ 沈铁梅

6月6日晚，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行的沈福存先生京剧表演艺术传承晚会上，播放了我的父亲沈福存40多年的演出影像。虽然图像已经模糊，但现场和视频里热烈的掌声融到一起，似乎变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演出，令人动容。

我的艺术生涯深受父亲的影响。我常常会想起他为戏而生、永攀高峰的一生。

1982年，父亲以近五旬的年纪，带着充满沈氏风味的“三出半”传统戏由渝到京，一炮而红。那无疑是他的艺术生涯中短暂的高光时刻。随着我在艺术上不断成长，在川剧界声名鹊起，他渐渐成了别人口中“沈铁梅的父亲”。我想，在为女儿感到骄傲的同时，他的内心是有些失落和悲凉的。

但在我心里，父亲就是传奇和翘楚。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他入行京剧时，钟爱的旦行已走入没落的阶段，但他青衣、小生“两门抱”。他抓住一切机会向“四大流派”偷师学艺，凭借自己的灵性、悟性以及坚持不懈的努力自学成才，60年代以青衣戏红遍西南；当自己的旦行艺术逐渐成熟之际，却又遭遇特殊年代，不得不转行老生；70年代末回归青衣表演赴京演出，在京剧界大红大紫后回到重庆又遭遇各种意外……可以说父亲一生经历了不少坎坷。相比而言，我虽然也经历过艺术道路的波折，但有幸生在一个好的时代。我自认为，父亲的艺术天资和水平是我难以企及的。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父亲曾这样形容自己的艺术追求之路。在我看来，这个“难”有多重含义。其一，作为一名京剧艺术家，他身处偏远的西南，没有真正师从“四大流派”任何一家，50年代学梅，后学张、程、尚，都学得很像，但他并不以“像”为终点，而是始终有个意识——怎么成为自己。他不仅广纳各派特色，还吸收了电影等艺术的特点，最终形成独特的表演风格。其二，京剧是阳春白雪的艺术，但父亲的表演还浸润了巴渝文化乐观、包容、开放的天性，“我的宗旨就是要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结合起来，争取更多的观众。”他以青衣为根本，融入花旦（做派）元素，活泼不失端庄，妩媚更显清丽，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极具感染力。这是他“站在大师肩上”既守成又创新的结果。父亲不仅对京剧表演艺术的创新实践孜孜以求，也让从事川剧表演艺术的我开了新智，发现了传统川剧艺术因为几百年流传过程中所在地域、环境等种种因素而形成过于生活化的特点。父亲还启发我，在川剧舞台表演和乐队编制的规范性、唱腔的高雅性方面进一步守正创新，从而更加符合当今的大众审美风格。

父亲一生是乐天派，在艺术道路坎坷难行之际，虽然也有过痛苦和委屈，但他通过对戏的琢磨、对表演的思考来化解，依然乐观面对生活。他对京剧艺术始终充满自信与热情，“只要我想得到，我就能做到！”他就是要做属于沈福存的京剧艺术表演风格。

70年代末，为了重回舞台，他从老生改回了旦角。他对传统戏没有大拆大改，而是“小地方找戏”。对于那些已经演了几百年的传统戏，努力把戏演活，特别注重火候的把控。他的“三出半”都是经过深加工、再处理的。他的“深”，在于一个“情”字。不仅站在戏曲规律、演员表演和塑造人物的角度去创造角色，更站在观众的角度去创造角色，处处以吸引观众、引发情感互动为重心进行艺术创造。

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带我们去看他的演出，回家后他还会把录音的磁带拿来反复听，琢磨每一处唱腔、细节的处理。父亲这种在长期表演摸索过程中形成的自觉，对我影响深刻。我在表演中也会注意通过停顿、延宕、拖腔、煞尾等方法来处理细节。无论是学传统戏，还是后来创编的《金子》《李亚仙》《江姐》，排练和演出后父亲都会和我重新细抠。每次看完我的表演，他都会用温和而严肃的语气对我说：“我给你一点建议……”

鲜为人知的是，从3岁开始学戏，直到2000年我已夺得“二度梅”后，父亲才当面夸我：“铁梅，你真的唱得好！”这句最简单的表扬，我等了十几年。他是我进入戏曲之门的引路人，赐予了我艺术生命，也用爱和教导一直陪伴着舞台内外的我。

我永远记得父亲病重时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他悄悄叮嘱我：“要保管好我的资料。”他一生为京剧艺术而鞠躬尽瘁，深知这些饱含自己心血的成果对于京剧艺术传承发展所具有的宝贵价值。

如今，我身上肩负着更重要的艺术传承责任与使命。我时刻都没有忘记父亲一生为京剧艺术所做出的努力，他用现代审美激活了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为京剧的继承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从根上找到了中国戏曲的创新之路：既保留剧种根本的风貌，又在传统中突围，赋予角色人性化和生命力。

父亲对我艺术生涯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融入血脉的，他就像我的一面镜子，也是照亮我艺术道路的永恒灯塔。

(摘自2025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摘自《人民日报文艺》公众号)



## 那一晚对羊肉的想念

□ 岑 嵘

九百多年前的某一天，宋仁宗赵祯在和近臣闲聊时说：“昨晚我睡不着肚子又饿了，好想吃烧羊。”近臣询问道：“陛下何不命御厨去做呢？”宋仁宗摇摇头答道：“如果我开了这个头，以后大家就会争先效仿，外面的人恐怕会把此作为制度去施行。我担心此后晚上宰杀牲畜的事就会成为惯例，这样造成的危害会十分大。”

这段君臣对话被记录在了《宋史·仁宗本纪》中，“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

赵祯不愧被称为“仁宗”，吃点羊肉也要想这么多，最后宁可自己饿肚子。

宋代的皇帝都喜欢吃羊肉。宋真宗时御厨每天宰羊350只，宋仁宗时每天要宰280只羊，宋英宗时减少到每天40只。

在宋代宫廷中，烤羊肉有烟熏、火烤、炭煨、石烹四大烧烤技巧，细分下去按照不同食材的搭配，又有二十多种烤制方法（据《梦粱录》《东京梦华录》）。这件事从侧面也透露了宋朝时御厨烤羊的技术很精湛，难怪连宋仁宗这位吃惯山珍海味的皇帝，也会半夜馋这一口。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官员到民间，羊肉成为了宋朝餐桌上的头等肉食。民间无论婚丧嫁娶，或是中秀才举人，还是烧香还愿，如果没有一只羊在案上放着，都不好意思招待客人。著名的吃货苏东坡甚至吃羊肉吃到腻味了（“十年京国厌肥羶”）。

既然从天子到百姓都这么爱吃羊，宋朝的养羊业也迅速膨胀起来，宋仁宗年间，昔日的产马重地陕西，每年就要牧羊16000多只。刑州、洛州等地都设立“牧羊监”。大片原先养马的草场，从此全改成养羊。

大宋的战马数量却也从此急剧萎缩。被羊“驱赶”失去牧场的马匹，就算存活下来，也是“急有征调，一不可用”。待到宋夏战争爆发，乃至后来金兵南下，北宋统治者不止一次惊奇地发现：大宋竟然没几匹马了。宋仁宗在位时就叹息“战马乏绝，何策可使足用”。

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原王朝基本形成了四大马场。北宋虽然丧失了四大马场。但其初期疆域还是包括陕西和甘肃部分地区以及山西大部。这些地方都是传统农、牧业混杂区，可以出产马匹。

当北宋西北买马通道被断绝的那年冬天，宋真宗对宰相吕蒙正表达了忧虑。“帝谓宰臣曰：‘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市于陕西，颇为烦扰。近年北面榷场贸易颇多，尚虑失于豢牧。’”吕蒙正言：“洛阳南境有广成川，地广远而水草美，可为牧地。”（《续资治通鉴长编》）

皇帝担心的居然是皇宫每年要吃几万只羊，得从陕西买，却还是不够吃这件事情，对于没地方买马这件事是一点都不担心。宰相回答很贴心，洛阳南面有个地方水草丰美，可以用来养羊。然后这么少数几个可以养马的地方就这么被养了羊。

马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强大战斗力离不开战马，而北宋竟然有三分之一的骑兵没有战马，这也导致北宋没法和当时的辽、金、夏抗衡，最终逃到杭州变成偏安一隅的小朝廷。

南宋的皇帝并没有改变对羊肉的喜爱。宋高宗爱羊，更青睐羊血粉羹，并喜欢用它作早膳。宋孝宗宴请大臣，打头阵的总是羊羹。宋宁宗过生日摆宴席时也忘不了羊肉，“侑食首以旋（用羊肉制成的酱），次暴脯，次羊肉，虽玉食亦然”。

当时的行在杭州酒楼林立，专门设有“丰豫门归家、省马院前莫家、后市街口施家、马婆巷双羊店”等肥羊酒店，还有一批兼营羊羹小店。南宋的《枫窗小牍》中说杭州最有名的是“薛家羊饭”和“羊肉李七”两家羊肉店。直到今天，杭州人还有爱吃羊肉的传统。

南宋从皇帝到百姓高高兴兴地吃着羊肉，而遥远的北方，蒙古大军正赶着望不到头羊群，从草原浩荡地出发，羊群就是游牧民族军事活动的粮食仓库。

那一晚宋仁宗咽了咽口水，他很想吃点羊肉。但想到半夜吃羊肉劳民伤财还是忍住了。宋仁宗有所不知，这一口美味的羊肉其实还关乎着宋朝的国运。

(摘自2024年6月28日《杭州日报》)

(●图片来自网络)